

AESTHETIC UTILITARIANISM

杜卫 著

审美 功利主义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

A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THEORI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审美 功利主义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

杜卫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郇中建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杜卫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ISBN 7-01-004244-6

I. 审… II. 杜… III. 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现代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063 号

审美功利主义

SHENMEI GONGLI ZHUYI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

杜卫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6 千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01-004244-6 定价:1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杜卫教授的新作《审美功利主义——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研究》，是一部很有新意的学术专著。据我所知，这部专著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斟酌修改而成的，是一部深思熟虑之作。

一半年之前，作者把已经通过论文答辩的稿子寄给我征求意见。朋友的诚心与信任，不容我推辞与敷衍。我认真地捧着他的大作阅读起来。他的开阔视野和崭新的构思，令我一口气读完十几万字的全文。他所评论的几个人物：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和梁启超等人是我所熟知的，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所使用的材料我也不陌生。但读完之后仍有强烈的新鲜感，深受启发。他之所思我所未即，他之所言我所未道，从而使我获得新的认识，此乃开卷有益之谓也。他的理论触角敏锐深刻，令我佩服，自愧不如。他之建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树一帜。掩卷沉思，确有“后生可畏”之感。情不自禁地立刻写了一封长信，详谈我的感受、体会和我所受到的教益。当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和问题，谨供他修改时的参考。事过一年有余，即2003年冬天，杜卫打来电话，之后又写了信，告诉我他的新作准备在北京一家大出版社出版，并要我为此书作序，我高兴地应允。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写出自己的个性风格，不人云亦云。所谓创新，最主要的表现是提出新问题或从新的视角解决老问题，从

而建树自己的一家之言。以此来衡量杜卫的新作，当之无愧。本书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发展过程的一般描述，而是探索中国古代美学转换为中国现代美学的逻辑起点，论述中国现代美育传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书所重点论述的几位代表人物，都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而发挥自己的见解，构建自己的理论的。但他们又都毫无例外地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相贯通，并且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他们的美学思想才有了生命活力。他们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启蒙者和理论建构者，是中国现代美育体系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们的理论体系，其思想之源既来自西方，又来自自己的历史传统，是中西融合的结晶。从而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美育新传统。这是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美育传统，而这种“现代性”又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现代性。这些问题，经过本书深入细致地分析，系统地论证和辩驳，清晰而有说服力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心悦诚服。本书反复论证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根本观点：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包括美学美育在内的新文化建设，只知照搬西方文化模式而不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结合，一味地墨守自己的历史传统而不汲取外国文化的异质因素，就不可能继续发展和进步；这个观点已被历史所证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不仅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等为我们提供正面的历史经验，也有不少反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些人只知照搬西方（包括苏联）的美学理论模式，单纯地传授西方的美学知识，用西方的概念演绎西方的思想资料，而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搭界，与现实需要存在很大距离，这样的论著出版了很多，虽然也适应了当时的某种

需要，但毕竟缺少生命活力，时过境迁，便被人们遗忘了。倒是如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宗白华等人，虽无美学美育方面的大部头著作，只有论文、讲演、批评、杂记等小块文章，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不忘。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人们作出如此选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杜卫教授在本书中对当前一些讨论现代性的著作进行深入地分析、批评，对于那种不顾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文化语境、历史发展水平及现实需要等的种种区别，套用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来评论中国当代的文化思想和实际问题，这实在是不得要领和无的放矢。正如本书前言所指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主要不是为了给西方现代性理论做理论补充或提供一种‘东方景观’，以增强其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甚至文化殖民能力，而是为了总结我们自己的美学传统，建设和发展我们自己今天和未来的美学。近年来，学界在谈到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时，常常涉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当代转换问题。这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因为我国当代美学在一段时期里，几乎与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割断了，而且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要求也似乎隔得很远。”这个批评是很中肯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一方面反省以往的历史经验，认识到西方的美学理论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借鉴，但它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公理”和规律，不能以照搬西方的美学理论代替自己创造；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些历史教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要重蹈覆辙。他们既不是客观地介绍、评述西方的美学思想，又不是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把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或西方的思想资料加以梳理、连缀，用自己的话语写出来，因而就变成了自己的著作，既不和自己的文化思想结合、比较、贯通，又无视自己所处时代

的现实需要。阅读这种东西实在令人乏味,因为它是“全盘西化”的结果。“全盘西化”是先辈们提出的过激口号,而在实际上先辈们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在青少年打基础时受到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在他们的骨子里血液里流淌的是自己传统的思想观念,积淀的是传统的集体无意识,外来的文化思想是不可能把这些属于“文化之根”的东西完全排挤掉。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尤其我们的下一代、二代……“全盘西化”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们所受的教育是以“西化”为主,传统的文化教育不仅处于极次要的地位,而且常常被置于批判否定的位置上,使不少人至今还以“与传统彻底决裂”为荣。长期在这种思想以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支配影响下,人们在记忆里“数典忘祖”而在行动上“崇洋媚外”,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审美功利主义”是本书的核心概念。运用这样的概念我本不赞同,因为长期以来一提到审美,其潜词就是“超功利性”或“无利害性”,“审美”与“超功利性”或“审美”与“无利害性”经常是作为同义词来用。现在把“审美”与“功利”同一起来,在意义上似乎自相矛盾,也与约定俗成的习惯不符。但这只是我的一种看法,不敢强加于人。退一步讲,即使是多数人的使用习惯,也不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同时“功利”这个概念,人们又常常把它和“功能”、“功用”混同使用,从而使“功利”的涵义、界限都不很清楚。而杜卫使用“审美功利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随意地标新立异,而是经过严格的界定和论述。审美功利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区分审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和政治功利主义,而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在作者看来,审美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都有极端片面的缺陷,为作者所不取,唯审美功利主义是从艺术—审美的性质和规律出发解释艺术—审美的功能作用,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并且这个概念是作者从先辈们运用西方“审美无利害性”观点解释中国的艺术—审美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不是凭空杜撰的。这种审美功利主义,已经形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更能表明中国现代美学的独创精神。这些大概就是作者提出审美功利主义概念的用意所在。概念是对实存的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而任何一种抽象、概括都是有缺陷的,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它要舍弃实存和具体,不可能把事实的应有之义都涵盖其中。特别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它要舍弃的东西更多,与具体存在距离更远。贵在运用这种涵盖宽泛、多义的概念时,能加以界定和具体化,使读者清楚明了,作者也不自相矛盾,而在这一方面作者处理得比较周到。

艺术—审美,其教育功能是深刻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塑造人的心灵,培养德性,涵养情操,提升精神的根本途径。它并像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艺术—审美无非是教人们如何美化生活美化自己的技巧,使人们得到审美享受和情感宣泄。掌握艺术—审美的技巧,追求审美享受和情感宣泄,这些的确与艺术—审美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教育的角度言,这些并不是艺术—审美的根本。掌握技巧是为了提高审美能力,而审美能力是做人的一种高尚生活能力,仅有技巧,不过是从事某种专业工作的“工匠”;审美享受是为了涵养精神,使人精神生活得到充实,得到积极向上的动力;情感宣泄是为了调解欲望、保持心理平衡,从而怡情养性,总之,不是为了宣泄而宣泄,不是为了享受而享受,也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艺术—审美有更高尚的目的。这些也正是作者提出审美功利主义概念所要论述的宗旨。

以上所言,自然不是对杜卫教授的大作进行全面的评论,而是就我所感触最深之点表达我的一孔之见和先睹为快之情。并以此

为序,希望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聂振斌写于 2004 年 1 月 9 日

中文摘要

20 世纪前五十年是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西方现代美学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引入了“审美无利害性”命题,中国美学和美育理论出现了追求审美、艺术“独立性”的重要转变。然而,十分关心中国社会变革和人生问题的中国现代美学家们怀着强烈的启蒙目的和人道主义观念,他们所提出的美学理论总体上都是以审美和艺术来改造人心、改善人生的审美价值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格教育色彩,因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关注美育,倡导美育,提出了极具时代特点和民族精神的美育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美育理论的丰富和深刻,或者说,中国现代美学的创建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美育问题为主导的。王国维、蔡元培和朱光潜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而梁启超前后美学思想的转变也可看做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在这个过渡人物身上的个案体现。

王国维在吸收西方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时的人生问题,创造性地把中国美学提升到“形上之学”的高度,并创建了具有现代中国时代意义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实现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并奠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思想基础。王国维提出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以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独特理解,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提出了“学术独立”、“艺术独立”等一系列颇具时代特点和本土化意义的观点,

确立了审美具有驱除个人物欲、私欲并促使情感升华的功能性心理机制理论,建构了关于审美和艺术的“无用之用”这个中国现代美学话语的规范语式,并赋予它从感性入手进行启蒙的思想文化含义。他关于美育性质、地位、作用的论述对中国美育理论的影响持续了整整一百年。

蔡元培不仅是一个美育思想家,更是一个美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实施者。他研究和倡导美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来对国人进行心灵的洗涤,去除其物欲和私欲,从而使国人建立起人道主义的理想。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明确地提出了通过感性进行启蒙的思想文化改造思路,这种美育思想为 20 世纪中国美育理论铸就了理论模式和思想方法,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最具有启蒙功利性质的美学思想。他关于科学与艺术是新文化运动的两翼的观点,充分表明了这种感性启蒙的美学理论并不排斥理性,而是主张感性与理性相协调,最终实现通过审美使人达到较高道德境界的席勒式的理想。

朱光潜前期美学论著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洗刷人心”,使人“脱俗”,具有比较强烈的入世精神;但是,他又主张“审美超脱”、“以情为本”、“人生的艺术化”,显露出与西方现代“审美主义”相似的思想倾向。这两种似乎矛盾对立的美学观念统一于他提出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和“民族生命力的复兴”的宗旨。他在主张美育的基本功能是提升人的情感的同时,强调了美育对心灵的解放功能,这种划时代的“审美解放论”充分体现了他对感性优先、生命力优先的肯定,具有明显的生命哲学意味。朱光潜强调生命力是要建立一种以充沛生命力做根基的新人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族,这是他前期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审美功利主义”的倾向使他的美学区别于尼采等人的西方现代审美主义。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在“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新文化运动语境中诞生的,它所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启蒙。但是,选择美育还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试图借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来作用于国人的“欲”和“情”,是为“感性启蒙”。因此,中国现代美育思想与西方现代性的美学不同,它主张不排斥理性和道德,而是主张与理性和道德相包容、相协调。席勒的美育理论给美育两种定位,一种是主张以美育来调解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恢复感性的地位,强调的是美育对于理性占主导所带来的文化和生存危机的诊治;一种是主张美育作为人从自然状态经过审美状态达到理性(道德)状态的中介地位,强调的是美育对于人类发展的基础性地位。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基本上都选择了后者,而相对忽视了更具现代性意义的前者,而且把席勒的通过审美达到更高的理性(道德)水平的思想同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给这种思想赋予了浓重的人格修养意味。这主要是由这些中国现代美学家意欲从感性入手进行启蒙的目的所决定的。

感性启蒙的出发点和归宿导致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走向“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是吸收了西方“审美无利害性”观念和中国古代儒家、道家的思想,又结合当时所面临的启蒙问题而形成的。它的基本内涵是:审美内在地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目的的欲念的功能,通过美育,以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国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摆脱物欲和私欲,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性。所以,审美功利主义不排斥审美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而是十分强调美育内在地涵养国人德性的作用。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都主张一种“德性的道德观”,肯定以人为根本目的的道德内在性和非直接现实功利性,这与审美的无利害性也刚好是一致的,这就使美与善合乎逻辑地达成了高度统一,使得审美功利主义

超越了现代西方审美主义所执著的审美与道德的对立。因此,它是一种在形而上意义上以启蒙为目的的人生论美学思想,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此,并以此区别于中国古代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而独树一帜。

这种针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双重影响而产生的“审美功利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是中国美学的另一种现代传统。真正构成中国现代美学的两大传统是政治、道德功利主义和审美功利主义:前者主张以审美和艺术作为政治斗争或道德说教的工具,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或道德目的;后者主张为人生美学,或者是人生论美学,反对审美和艺术直接充当政治或道德的工具,而是要求审美和艺术内在地作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前者在19世纪的直接思想源头在梁启超,而后的开创者是王国维。

“审美功利主义”可以被确立为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这是20世纪前50年多数美学家的一种“共识”,不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如此,而且青年鲁迅、吕澂、林语堂、宗白华、丰子恺等人也如此。我国当代美学界以前过于关注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和道德教化的美学思想传统,相对忽视了以启蒙为宗旨、着眼于思想文化重建的美学思想传统,这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实质。第二,它源自中国现代化自身的问题,是试图以中西思想文化资源来创建新的思想文化,从而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扎根于中国本土而又有创见的现代美学传统。第三,它是中西美学以及思想文化交融的创造性成果。审美功利主义思想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美学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文化,二者

的融合直接针对着中国当下思想文化问题之解决,在如何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如何处理中国和西方美学思想的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等方面,形成了可供今人借鉴的方法论。第四,它对后来的中国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美学中有许多观念、术语和语式都来自于这种现代美学思想,具有一种穿透历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因此,这种美学思想是今天建设中国美学的最直接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 现代性 “无用之用” 感性启蒙
审美功利主义 中国美学现代传统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ies. Under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especiall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 Chinese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ies take an important turn for aesthetic autonomy. However,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ians, who concern themselves deeply with social changes and life problems, put forward, with their strong enlightenment purposes and humanitarian outlooks, aesthetic theories which are on the whole theories of aesthetic values that argue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n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fe through the aesthetic and art. These theo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sense of personality education. Many of the aestheticians, therefore, follow and advocate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advance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ies marked by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national tradition. In this sense,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is the richness and profoundn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ies. Wang Guowei, Cai Yuanpei, and Zhu Guangqian are typical aestheticians in this respect.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thought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ng Guowei, while addressing the life problem of the time, creatively

approach Chinese aesthetics from the high plane of metaphysics, and establish the aesthetic utilitarianism in its modern Chinese sense, thus fulfill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lay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odern Chinese theor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his distin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osition of the aesthetic utilitarianism, he creates the functio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which applies aesthetic to repel material and selfish desires. He constructs the standard expression of “usefulness through uselessness” in the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discourse regarding aesthetic and art, and he endows it with a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enlightenment from perception.

Cai Yuanpei is not only a thinker but an active advocator and implementer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primary purpose of his research and advocacy was to purify the heart and soul and to repel material and selfish desires through the “detached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aesthetic so as to enable the fellow countrymen to set up humanistic ideals. In his argument to replace religion by aesthetic education, he lays down clearly his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perceptual enlightenment. His thought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shap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method of thinking for the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re the most utilitarian enlightening aesthetic thought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His idea that science and art make the double wings for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aesthetic theory of perceptual enlightenment will not necessarily exclude rationale, instead he insists that perception and rationale be coordinated, and in time, to realize the Schilleristic ideal for

human beings to be more virtuous through aesthetics.

The core supposition in Zhu Guangqian's earlier works on aesthetics is to "purify the heart and soul", to make man "refined", thus indicating a strong spirit of secularity. On the other hand, he argues for "aesthetic detachedness", "emotion-centeredness" and "the artistry life", manifesting an ideological trend identical to the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ism". The two apparently contradictory aesthetic concepts was unified in his well-known speech as "undertake secular functions with insecular spirit", aiming at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al vitality". While emphasizing the basic emotional fun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he lays stress on its liberating function to the heart and soul. This epoch-making "theory of aesthetic liberation" fully demonstrates his affirmation of priority on perception and vitality, and contains an obvious implication of a philosophy of life. His emphasis on vitality is to create a new life, a new morality, a new culture and a new nation based on unflinching vitality. Th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lso the destination of his earlier aesthetic studies. This trend of "aesthetic utilitarianism" makes his aesthetic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ism of F. Nietzsche and many others.

The modern Chinese theori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akes its shap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is expected "to solve problems from the mind and the culture". Enlightenment is the problem to which it has to directly address. There are, however, some other significance for the cho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at is to influence the "desires" and "emotions" through the "superiority" and "universality" of aesthetic, or rather "perceptual enlightenment".